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五十三卷第七期

二〇二三年七月

ISSN 1008-942X  
CN 33-1237/C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7/2023

Vol. 53, No. 7 July 2023

Zheji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ban)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编辑委员会

- 主 任

黄先海
- 顾 问

(以下按姓氏音序排列)

束景南 田正平 王重鸣
- 编 委

白谦慎 褚超孚 何莲珍 胡 铭 黄 旦 黄先海 李 实

刘 斌 刘海峰 刘海涛 刘同舫 罗卫东 毛 丹 倪梁康

桑 兵 史晋川 眭依凡 王 杰 韦 路 魏 江 吴晓波

徐 枫 徐小洲 许 钧 姚先国 余逊达 郁建兴 袁亚春

张俊森 张涌泉 赵鼎新 赵志荣 周江洪
- 特约编委

卜宪群 孙笑侠 袁振国 张 军 张永清
- 国际编委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伯纳黛特·贝克(Bernadette Bake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杰瑞米·克莱格(Jeremy Clegg):英国利兹大学教授
- 主 编

黄先海
- 执行主编

朱希伟
- 执行副主编

陈 洁 钱文荣 赵 骏
- 特聘高级编辑

徐 枫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 浙江大学主办

目次

CONTENTS

●2023年 第7期 ●第53卷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主题栏目:数字经济与数字管理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的智能投资顾问用户采纳意愿链式影响机制研究  
吴晓波 张伟齐 李思涵 邹腾剑( 5 )

机器人渗透对城乡收入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  
马述忠 吴 鹏 潘钢健( 20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黄先海教授

主题栏目:二十大精神阐释·涉外法治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外援型比较法的四重移植逻辑  
郭晓明( 39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赵骏教授

公共管理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何以引发社会风险?  
——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  
吴金群 刘花花( 51 )

工业用地的二级市场流转如何提升用地效益  
——基于S省X市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卢圣华 汪 晖( 65 )

经济学研究

我国虚拟集聚水平测度、空间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田 霖 张仕杰( 75 )

期刊基本参数: CN 33-1237/C\*1955\*B\*A4\*168\*ZH\*P\*¥ 70.00\*1800\*12\*2023-07



本刊鼓励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秉承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学风,积极传播先进文化,严格按国际惯例实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努力为具有原创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机会。

匿名审稿 欢迎订阅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审稿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等14个著名国际索引收录

主题栏目:宋学与宋韵文化研究

词史之间:夏承焘学术志趣与近代新宋学 张 凯 薛宏宇(98)  
宋代新兴词调名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韵 姚逸超(109)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陶然教授 陈野研究员

主题栏目:汉语史与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字研究

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 高 源(125)

□ 语言学研究

汉学家科布泽夫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与翻译 袁森叙(137)

□ 历史学研究

古希腊的信用、货币与利息 李秀辉(146)

□ 文学研究

“以文史代织经”:清代闺阁书写与儒家妇德规范新论 吴 琳(160)

校史专栏:民国时期浙医与浙大的两次合并尝试(六) 陶仁人(124)  
学术资讯 (38)  
本期英文目次 (4)

出版日期:2023年7月15日

本期执行编辑:徐 枫 刘双庆 周梦烽 郭琳琳

# 古希腊的信用、货币与利息

李秀辉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信用在古希腊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物品的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 小额铸币成为借贷对象既推动了货币的使用和利息的发展, 又使得信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正式化。在古希腊, 亲友和邻居间的互助是风险应对的主要方法, 信用和债务关系包含在互惠式礼物的社会整合方式之中。利息的产生代表着熟人圈子之间的互惠互助向陌生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的转变。对利息性质的理解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利息是债务双方基于互惠甚至自愿相互协商的结果, 一种是将利息看作债权人的权利而强加于债务人, 分别代表着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对利息的不同理解。古希腊利息收取的比例是比较固定的, 具体数额是在非正式的习俗和惯例中形成的。附息借贷的一个社会影响是瓦解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紧密社会关系。当整个社会的债务积累数量巨大, 社会秩序会遭受重大冲击时, 债务取消就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选择。

**[关键词]** 古希腊; 信用; 货币; 利息; 债务取消

## 一、引言

信用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 广义上是指在社会交往的互惠过程中因给予而累积的社会声望, 或物品和货币的借还过程中所处的相互亏欠状态, 通常指基于信任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包括债权债务关系; 狭义上指货币的信贷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信用在古希腊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物品的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小额铸币成为借贷对象既推动了货币的使用和利息的发展, 又使得信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正式化。“通常认为古希腊罗马精英的道德约束反对货币, 附息债务抑制货币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信用文化是古典社会货币动态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 政治结构、制度和规范行为是主要条件。”<sup>[1]12</sup> 利息的收取在古希腊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争论, 也引发了关于债务取消的政治博弈。可以说, 信用开启了研究古希腊社会经济基础的一条重要线索, 从内嵌于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整合方式中的暗线, 到结合货币在市场交易兴起后依托银行机构发挥作用的明线, 对推动古希腊社会的商业化和货币化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国内对古希腊信用关系和货币制度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 希望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能够在哲学文化层面之外提供理解古希腊社会的另一个维度, 也能为中西方世界两种独立起源的经济金融制度的比较打好前期基础。

**[收稿日期]** 2023-01-1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3-07-03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89; 22&ZD033); 复旦大学—金光集团思想库2022年度研究课题(JGSXK2201); 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4015C50222204164)

**[作者简介]** 李秀辉(<https://orcid.org/0000-0002-5650-8415>), 男, 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货币理论与货币史研究。



## 二、古希腊信用的概况与特征

在古希腊,信用既涉及小额的物品借贷和典当,又涉及大额的货币借款,信用的形式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无息的和附息的等等。“对穷人生活习惯的记录提到,穷人为了一些紧急的小额债务典当他们不太贵重的物品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sup>[1]100</sup>不只是穷人,古希腊其他阶层的人也习惯于信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作用,这可以在戏剧作家的表述中找到依据,“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将以信用过活看作阿提卡(Attika)居民的正常生活状态”<sup>[2]74-75</sup>。到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信用活动和信用结构已发展得相当完善,而且据现有史料也能还原许多具体的细节。“希腊没有发展代币(token money),信用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广泛存在,现存的证据很多,但即便如此,信用关系主要是存在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银行之间。”<sup>[3]144</sup>这一时期的雅典是古希腊信用活动发展状况的典型代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充斥着借贷,其中包括大小卖家提供的可能令人惊讶的融资”<sup>[4]5</sup>。因而也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从古风时期到公元前4世纪信用的结构和观念是如何发展的”<sup>[5]51</sup>。

美索不达米亚人留下了早期借贷活动的记录,用实物或货币计价和结算。“债务有时用白银计算,有时用大麦或其他物品计算,白银的利息可用大麦计算,规则本身在于可用其他物品归还所借的物品。”<sup>[6]45</sup>古希腊债务记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传承于美索不达米亚,在石板上记录债务,债务清偿之后则将记录抹去,“所需的唯一‘合同’是一块石板,在上面记录客人的名字和所欠的金额”<sup>[7]189</sup>。在斯巴达则用塔利木棍来记录债务,这种方法在之后的英国也曾广泛应用。“拜占庭学者佛提乌斯(Photius)引用狄奥斯库里得斯(Dioscurides)的说法描述了斯巴达人在债务记录中使用‘塔利木棍’(Tally sticks)。”<sup>[5]20</sup>

古希腊信用和借贷最直接的证据是各类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虽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大致可反映那时社会信用发展状况的一个侧面。“由借贷而来的隐喻在文学的各分支中数量众多,散布各处。”<sup>[5]6</sup>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陶器表面的绘画都有涉及信用的题材和情节。“在喜剧和绘画之外,信用也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的遥远角落找到了一席之地。”<sup>[5]6</sup>这些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古希腊信用活动的发展情况,还能反映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观念和看法。例如,“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Hesiod)所观察到的义务网络是本地性的,信用关系不超出村庄”<sup>[5]35</sup>。信用关系在当时所辐射的范围比较狭小,而且借贷性质和信用结构都有浓重的时代特点。即使“货币出现,用于支付和赔偿,也不能被看作信用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转向经济制度的一个作用因素”<sup>[8]143</sup>。

古代社会中所存在和起作用的信用关系与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信用关系有很大的不同。“雅典信用借贷的特点都强调信用制度的古今概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sup>[5]7</sup>,这里涉及古代信用制度的研究方法问题:是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分析古代的经济现象,还是立足于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境分析经济现象的性质和作用?这是经济史分析方法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的延伸,这两种方法的争论源自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主张的实质主义胜出而告终。“对现代人类学家研究的原始经济而言,实质主义框架已经是研究该主题的主要的,甚至是统治性的方法,永久地改变了那些即使反对波兰尼最武断的主张所讨论的话语。”<sup>[6]25</sup>波兰尼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芬利(Moses Finley),并由芬利将其引入经济史的分析。“分析雅典城邦的信用和银行存在着两种路径:现代的和芬利的”<sup>[8]144</sup>,芬利借鉴和传承了波兰尼对古代社会的实质主义分析方法,以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实情况,毕竟古代社会在整合方式和意识观念上都与现代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希腊城邦借贷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起主导性作用,市场在信用供给及其应用目的中的次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证实。”<sup>[8]148</sup>

这一情况同样可从词源学上找到佐证。信用在古希腊对应的词语是“pistis”,代表广义的信用

关系。“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pistis看起来是狭义的‘信用’之意,很少指经济意义上的‘信用价值’。”<sup>[5]7</sup>信用关系是嵌入在当时社会的亲情和友谊的互惠关系之中的,并产生了与邻居和朋友等之间共享互惠的社会交往关系。信用在古代社会主要不是一个经济价值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和维系问题。“债务不仅是一个金融交易问题,在共同的话语上它可以很好地反映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加强,获取声望和信誉可能是比关心金融收益更重要的动机。”<sup>[9]xvi</sup>

### 三、古希腊信用与货币的相互作用

不仅古代信用与现代信用存在巨大差异,信用与货币之间也存在很大不同,在社会关系层面,前者比后者更为基础,历史也更为久远。“因为债务及其支付可以涉及任何物品,信用实际上独立于货币或铸币的发展。”<sup>[1]96</sup>虽然信用和货币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当二者合流,彼此作用,强化了各自的发展,债务更多地用货币计价和支付。早期专用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主要面向社会义务的解除,包括赎金、罚金、贡品和税赋等等。即使简单的原始货币也有可能搭配庞大的信用系统,毕竟后者比前者更为基础。例如,“人类学家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在20世纪20年代初访问罗素岛时就发现了一个基于贝壳货币的高度复杂的信用系统”<sup>[5]18</sup>。同时,早期的谷物等实物既发挥债务计价和清偿的作用,也与货币有密切关联。“实物(谷物)支付以及谷物债务具有特定的货币功能,并发展出与现金经济的紧密关联。”<sup>[1]93-94</sup>

到了古希腊,信用与货币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发展,铸币的使用,特别是小额铸币的日常流通,加剧了这一进程。“古典时代末期,铸币已经潜入信用结构的每一个层面,从小额的可用实物或聚餐提供的友情信贷,到几个奥波尔(obol)作为一天小生意的‘商业’贷款,再到银行和神庙的大额借贷。”<sup>[6]193</sup>举债的目的大都与货币的作用和功能密切相关,涉及互惠和再分配等方面,所以信用和货币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有很多的交集。借贷主要是社会生存和社会交往中的必要因素引发的,极少是经济上的或生产性的。“雅典人典型的举债原因几乎不可避免地与生活令人不快的无法逃避的情况相关:赎金、罚金、葬礼、饥荒、税赋和公共服务等。”<sup>[5]72</sup>除了因生活必需的支出需要举债之外,上层阶级也会因奢侈消费等而举债。“政治家明显因消费而陷入债务的证据主要集中于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30年左右。”<sup>[5]67</sup>在希腊城邦共同体中,借贷的首选对象往往是熟人、亲戚、朋友和邻居等,无息的和附息的非正式债务是两种主要的借贷形式。“公民之间的距离,物理上的和隐喻性的,都带来了一种借贷的相反类型(笔者按,指正式债务)的可能,即信用结构的另外一边。”<sup>[5]35-36</sup>随着社会关系和阶层距离的增加,陌生人或专业的放款人才会成为普通公民借贷的考虑对象。“借贷的第三种形式是作为典当商人的专业货币贷款人和私人银行家。”<sup>[1]107</sup>

在古希腊城邦,不仅举债的原因和用途,而且举债的对象和机构都主要基于社会交往关系,经济原因则居于次要地位,这形成了古希腊社会复杂的信用结构。除了个体之间非正式的互惠式借贷之外,最早进行借贷活动的可能是古希腊的神庙,从现存的碑文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从碑文中所得到的细节显示,根据雅典神庙所涉及的金融操作类型的知识,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神庙信用借贷的功能仅局限于将资源转移到空虚的国家金库中。”<sup>[5]172</sup>神庙的信用借贷是为了实现其再分配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一种辅助性的从属业务,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早期的其他信贷提供者。“这些制度和私人放款人类似,往外借钱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只是一个保持或增加收入的副业。”<sup>[5]172</sup>即便如此,古希腊的借贷活动仍然非常常见,分布在不同的交易种类中,其各自的债务规模也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如表1所示<sup>[5]200</sup>。

信贷活动的广泛进行也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货币的不足,“古代经济中信用和其他方式可用于增加货币供给”<sup>[1]92</sup>。但另一方面,信用也会对货币产生替代作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铸币的流通。“基于货币的信用和无现金支付等形式使流通的铸币更难起作用,因为信用会增加自身的权力和影响。”<sup>[1]16</sup>在这种既互补又替代的相互作用中,信用活动借助货币使用而迅速发展,同时信用也为货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这可以在与货币制度密切相关的古代法律体系中体现出来。“古代私法中的债务法最为发达,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信用制度在古代的发展表明,古代货币经济高度依赖信用的发展。”<sup>[1]93</sup>古代社会货币制度的发展有赖于信用,而信用关系存在的主要原则在于农业社会的单个家庭很难应对各种风险,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需要借助互惠式的非正式借贷渡过难关,因而其信用关系具有浓重的礼物互惠色彩。

表1 不同交易类型的债务规模

债务规模	交易类型				
	演说辞中的土地担保	由界碑确定的土地担保	海事合同	银行	其他
平均/德拉克马	1 300	1 500	2 600	2 250	1 380

四、古希腊信用的礼物互惠式内涵

“借贷不是新东西,避免借贷在希腊人中间从来不是一个理想,在一个农业社会也不是一个理想。在农业社会,一件贵重物品可以合理地许多家庭服务,而坏运气则会使一个家庭陷入暂时的困境,只有邻居的帮助才能脱困。”<sup>[6]181-182</sup>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低,多数家庭的经济条件处于温饱线水平,很难独立应对各种风险,亲友和邻居间的互助往往是风险应对的主要方法。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礼物交换中表现的信用在前现代和部落社会中是重要的制度”<sup>[8]143</sup>。同时,对身处困境中的亲友施以援手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甚至是一种社会性的“投资”,将来会有回报的。“在亲戚、朋友和邻居等私人交易中,几乎自动期望在未来有一个互惠性帮助:债务是更广泛关系的一部分。”<sup>[5]99</sup>这种互惠性帮助可能是实物的,也可能是货币的,信用和债务关系包含在更高层次的互惠式礼物的社会整合方式之中,因而,“互惠与信用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我们对古代雅典的借贷分析中至关重要”<sup>[5]7</sup>。

从互惠和礼物角度研究信用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思路。对身处这种习俗经济中的人而言,“友谊是作为命运无常的世界上的一种保险的形式而出现的”<sup>[5]120</sup>。友谊在此具有强烈的功能性色彩,自然也存在为功利性目的而建立的友谊。“这意味着通过采取积极措施,潜在有用的人们可以形成一种友爱型的关系。”<sup>[5]118</sup>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友谊的这种功能和作用,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62b21-63ab)讨论友谊的部分用了很长一段文字分析信用关系的两种不同类型<sup>[5]40-41</sup>。这是一个对所有时代都有意义的永恒性议题,熟人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货币债务在古代社会非常常见,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研究前工业共同体中个人关系的文献都评论了邻居之间复杂的现金信用网络。”<sup>[5]145</sup>就如同铸币在古希腊社会具有多元属性和功能一样,现金信用网络在古代社会更多的是一种互惠式社会关系纽带,而不只是风险应对的工具。“公民将债务看作产生和维系友爱的纽带之一,虽然这种更具建设性态度的现象在我们的工业社会中也存在,但是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将债务看作维系友爱的纽带才作为主导观念出现。”<sup>[5]218-219</sup>

债务内嵌于互惠式的友爱关系,这提供了信用起源于礼物和互惠关系的重要线索。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是研究礼物和互惠的权威,他“认为信用开始于礼物赠予制度之中”<sup>[5]27</sup>。莫斯认为,互惠式礼物关系主要作用于社会关系亲密的熟人之间,通过“送出一接受一回赠”式链条循环往复地进行礼物流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确立社会的秩序和等级。非正式的借贷关系也是发生在亲友和邻居之间,基本上与礼物作用的社会范围重叠,因而,礼物不仅为理解信用的起始提供了基本逻辑,也为分析古希腊信用关系提供了正确方法。“在来源于雅典的材料中有大量



关于借和贷的材料留存,只有从莫斯所确定的礼物交换关系角度才能说明其全部的意义。”<sup>[7]183</sup>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中,公民有其固定的社会交往关系,朋友之间的现金借贷在城邦的社会交往中很常见。“互惠和信用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我们对古代雅典的借贷分析中至关重要”<sup>[5]7</sup>,互惠式礼物与债务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接受礼物和恩惠本身就是债务关系形成的一种方式,虽然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而送出礼物和给予恩惠则会处于社会关系和信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是获取社会声望和地位的一种方式。“在物质商品上付出比接受方所能回报的更多,加上回报的时间延迟,在付出方和接受方之间形成一种永久的债务关系。”<sup>[10]79</sup>债务起源于礼物,即使是正式的货币债务,如果在亲密的社会关系环境中被免除而不需要偿还的话,也不意味着互不亏欠,债务只是被转化成了礼物,债务人仍然处于亏欠的状态,要在将来以某种方式对等或更多地偿还或者说报偿。债务起源于礼物,也可以转化成礼物,礼物本身也是某种形式的债务,其主要功能是形成和维系社会关系。亲密的社会关系中的债务关系,即使涉及货币的借贷,通常也不付利息。但这种互惠关系中,回赠的礼物或报偿的物品通常要比之前所接受的多一些,不是经济上的利益计算,而是使对方处于进一步的债务关系中,代表亲密的社会关系在未来的延续。

古希腊的信用和借贷的含义与现代意义的用法有很大区别,其含义更接近于我们所知的熟人之间,特别是亲友之间的无息借贷。“对借贷的系统调查似乎表明信用的互惠和整合对普通公民的生活来说更加重要。”<sup>[5]220</sup>债务内嵌于互惠的礼物关系,这种整合社会交往关系的方式是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债务只是其表层的表现形式。债务的成立代表互惠式社会关系的一个开始,债务的清偿则意味着这种社会交往关系的加深和新一轮互惠的开始,往复不断。“即使正式的债务偿付已完全完成了,借款人仍然处于对他的前债权人的人情债务之下。”<sup>[5]122</sup>所以说,只有从莫斯的礼物角度才能完整地认知古希腊社会的信用和借贷关系,它不是现代意义的信用建立及其清偿合同,不是契约,而是互惠。古希腊的信用借贷“是个人信用、礼物赠予和互惠紧密一致作用的结果”<sup>[5]219</sup>。当然,这种信用、礼物与互惠的紧密一致主要局限于熟人网络之中,既能维系社会关系,又能防范社会风险,这决定了其辐射的范围比较小。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要花大量的物质和精力维系这种互惠式社会关系。“除非要创造一种慷慨或奢侈的公众印象,否则,一个普通公民应该限制他互惠出借的范围。”<sup>[5]40</sup>慷慨有助于有野心的政治家获得社会声望和公众支持,这是一种政治回报,而普通公民的财力和精力并不允许其进行大范围的互惠出借。

词源学上的证据也提供了一种债务和礼物紧密结合的思路和佐证。“单词 *daneion* 和 *daneizein* (债,借贷)在词源上来自礼物赠送的概念,包含了从食物和饮料的提供到实物和现金的转移等各种慷慨的行为。”<sup>[1]96</sup>不仅是这两个单词,在其他的希腊词汇中也能找到礼物和债务的关联,“表示‘给予’和‘出借’的不同希腊词语都是紧密相关的”<sup>[5]28</sup>。给予和借出都代表向外拿出的意思,分别形成了礼物和债务的不同意义。二者不仅紧密关联,在词源学上甚至可以梳理出一些词的含义从礼物向债务的逐渐转变。“柯福(Korver)尝试性地将这一顺序解释为 *danos* 变化的含义的表现:从作为荣誉的礼物(*geras*)和送给祭司的祭品(*meris*)的一部分,到一般性的礼物,然后是债务。”<sup>[5]29</sup>债务关系正是这样从礼物和互惠中发展而来,在词汇上有清晰的体现。“所举的每一个例子在变化过程中本质是一样的,原本代表礼物赠予的某些物品的词语,慢慢地调整为代表债务交易。”<sup>[5]30</sup>

在古希腊的这种互惠式借贷中,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形式,可称为“爱诺斯互助贷款”(the *Eranos loan*)。该制度以聚餐共食为最初形式,代表最原始的一种互惠共享,用于熟人之间的互助与借贷。“正如所看到的,以互惠为重点的爱诺斯隐喻是雅典作家经常使用的。尽管没有一个幸存的消息来源系统地描述过爱诺斯信用,但理解其基本机制并不存在任何困难。”<sup>[5]153</sup>因为即使在现代社会,熟人之间仍会存在互助贷款的各种形式。“尽管几乎所有的爱诺斯互助贷款的案例所涉及的都是富有的公民,但也有线索表明这一制度在雅典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起作用,甚至是奴隶阶层。”<sup>[5]77</sup>这种互

惠式借贷在古希腊有着比较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应对生活中的一些不时之需。“爱诺斯互助贷款等是用以帮助人们摆脱困境的,而非帮他们获利的。”<sup>[5]215</sup>反之,人们用于逐利的生产性贷款一般不会在熟人之间筹措,“虽然没有别的证据,但这将与流行的看法一致,即当人们想要出于生产性目的举债时,他们会被迫在通常的信用关系网络之外搜寻”<sup>[5]215</sup>。正如古希腊人对逐利目标的贬低和鄙视,在礼物交往中若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则会彻底丧失社会声望和地位,被等同于地位低下的商人和外邦人,甚至是妓女和乞丐,而将互惠式借贷用于生产性获利的行为也会被归于同一行列。“他们自然会斜眼看那些友情债务的接受者,因为他们利用朋友的慷慨为自己谋取金钱利益。”<sup>[5]73</sup>

爱诺斯互助贷款等互惠式借贷是希腊城邦中公民借以摆脱困境的首要选择,但人们又反对和拒斥以营利为目的的借贷行为,这客观上挤压了正式的有息债务的生存空间。“雅典小额货币债务的相对缺失可能部分归因于爱诺斯互助贷款的存在,部分归因于现存资料的偏向性,缺乏来源于社会底层的相关资料。”<sup>[5]145</sup>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的信用结构与现在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人们主要依赖互惠和共享来获取信贷支持,“私人放款人、朋友和家庭看来提供了比今天更大的可用信贷的规模比例”<sup>[11]46</sup>。

古代世界的信贷目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关注,“债务主要用于生产还是消费主导了20世纪古代信用问题的讨论”<sup>[1]95</sup>。从现有资料看,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古希腊信用借贷主要用于社会性和生存性的必要支出,较少用于消费性支出,用于生产性的就更少了,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信用结构特征。“生产性信贷几乎完全缺失,但有一个无息信用交易网络繁荣发展。”<sup>[5]170</sup>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生产性借贷的存在,特别是零售业的小额商业贷款。“一些借款人本来会借钱消费,但钱也被用于生产目的。雅典的大多数贷款都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这一推论受到了挑战。”<sup>[12]151</sup>对于这种独特的信用结构,特别是以爱诺斯互助贷款为代表的互惠式借贷,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学术著作中也多有提及。“安提丰(Antiphon)的《四联辞》(Tetralogies)或示范演讲中一个想象的辩论者表示,爱诺斯互助贷款是一种与礼仪性支付相关的公民义务。”<sup>[5]157</sup>柏拉图似乎是不支持爱诺斯互助贷款的,以为它是非正式的习俗行为,与正式的法律制度相去甚远。“柏拉图不能企图将缺少法律规制作为遏制爱诺斯互助贷款的原因,后者与礼物很接近,它加强了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支持,而这种相互支持是柏拉图在《法律篇》的其他地方加以鼓励的。”<sup>[7]187</sup>法律是正式的制度,用于整合和规范陌生人所构成的规模更大的社会群体的秩序,而陌生人存在于希腊个体公民的熟人圈子之外,也在互惠式借贷关系的所及范围之外。陌生人之间的信用关系不能诉诸互惠式的礼物逻辑,而要借助以物易物或商业交易的逻辑。“对待陌生人,不能简单地帮忙或给予礼物以期待日后的回报,所以整个互惠互助的关系被压缩成单一的交易,一方获得所需物品,另一方得到利润。”<sup>[6]183</sup>从熟人圈子到陌生人交易,互惠变成了商业,将来的回报变成了即刻的支付,社会交往的情谊变成了法律契约的精神。“因为没有对将来互惠帮助的期待,债务回报或者说礼物就被利息的支付取而代之了。”<sup>[5]36</sup>

## 五、古希腊利息的性质及其争论

利息的产生和收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熟人圈子之间的互惠互助向陌生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的转变和突破,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个质的变化。“无息债务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互相帮助的预期,而收取利息取代了未来恩惠,并终结了这种考虑。”<sup>[7]183</sup>附息债务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说明熟人社会开始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具体家庭和个人的可用信用渠道有了更多的选择,虽然是次要的选择。“常识说明人们使用闲钱的方式通常集中于借给那些他们熟悉的公民同胞”<sup>[5]40</sup>,彼此的熟悉可以让借出人有把握在将来获取某种形式的回报以及顺利拿回本金,但在与不熟悉的人建立信用关系时,就需要有对应的预防和担保

措施。“超过这个点,出借人要求某种正式的约束来保证归还就是合理的了。”<sup>[5]40</sup>为了应对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风险,用财产作抵押或找相关的人作担保,并支付相当数额的利息,就成为与不熟悉的人进行借贷业务的主要方式。“像这样的短期借贷,限制出借者的风险看起来是不发达经济中非制度性信用的一个重要特征。”<sup>[5]103</sup>风险的限制和防范成为利息收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用于解释利息的合理性。“那时许多人经常带息借出,一种竞争的意识开始兴起,考虑过的利息都是合法的。”<sup>[6]183</sup>在这样一种趋势下,附息借贷也逐渐渗透到共同体内部,并与互惠式帮助共同起作用,“一些社团做出安排的议题之一是将信用扩展到他们的成员中”<sup>[5]171</sup>。同时,参与借贷的主体也开始从家庭和团体转向个人,增强了个人参与经济事务的能力。“这至少使得个人基础层面的借贷关系由于来自团体的信用而加强,这些信用是国家和私人团体的分支。”<sup>[5]171</sup>由于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陌生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古希腊城邦的商业贸易和社会生活之中,在信用借贷领域,市场交易取代礼物互惠成为主导的借贷方式。“这开启了利息支付的时代,它是对回报恩惠的替代。”<sup>[5]40</sup>

但利息征收从其出现之初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认为货币是无生命的物品,不应该孳息,收取利息是有违自然且不道德的。“对于偿付本金的道德义务和强征利息的非道德剥削之间的区分在公元前4世纪一直存在,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收取利息的反对中。”<sup>[5]99</sup>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要从法律制度和道德哲学层面对利息征收进行认知和批判,而不是从互惠式礼物发展演变的角度,这有悖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脱离当时实践的观念,其前提是正式信用与互惠信用两套系统是水火不容的。”<sup>[5]44</sup>正如债务和礼物会相互替代和转化一样,互惠回报和利息收取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甚至相互融合的,“一种聚焦雅典借贷的实践和模式的替代性评估可以说明有息和无息的两种信用系统的融合”<sup>[7]183</sup>。这两套借贷系统相互融合的程度和范围可以反映古希腊社会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发展进程,利息的出现是古希腊借贷关系和信用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如果说两类信用关系有简单的区别,那就是利息的收取。”<sup>[5]36</sup>利息代表的不仅是正式和非正式的信用关系之间的区别,而且是互惠共享和法律契约两种回报方式的对比。“雅典模型里的利息有一个明显的道德功能,它区分了私人的债务和具有更正式基础的债务。”<sup>[5]99</sup>利息的道德功能还表现在它被排除在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熟人社会圈子之外,因为利息的收取与货币交易一样,会消解熟人网络中亲密的社会关系,“利息收取被看作有违于雅典社会关系的广泛背景”<sup>[5]98</sup>。毕竟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社会的主要整合方式仍是以城邦权威再分配的政治架构以及以公民家庭和家族为基本单元的熟人互惠网络,市场交易仍然处于次要地位,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凌驾于逐利行为之上,“雅典的道德法规使其公民很难像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那样行动”<sup>[5]98</sup>。雅典的信用案例表明,雅典人有能力产生信用的复杂种类,而这些种类与现代社会的信用业务有很大的区别。

正如债务可能源自礼物,利息则是互惠回报因为无法保证在未来实现而转化成的当下折现,而且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假设已经预先做好,希腊世界的利息可能源自借款方的自愿行为,是额外的支付,它在合适的过程中转化为一种义务性的费用,由出借人的决定而实行。”<sup>[5]99</sup>利息最早可能是借贷双方友好协商的结果,甚至由借款人自愿提供,因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确定的经济利益回报可能要比未来的互惠式礼物回报等不确定的形式更受出借人的青睐。利息是出现很早也很复杂的概念,对它的完整理解也是比较困难的。“利息理论一定是经济分析中最难的方面之一,有着令人沮丧的相互重叠的范围和相互矛盾的理论。”<sup>[5]92</sup>对利息的解释也是充满争论的,不止一条认知路径。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利息的批判则代表另外一条理论思路,认为利息与动物的繁殖有关系,而且似乎可以找到词源学上的依据。“传统理论以词源学上的tokos一词为主线,表示‘利息’的常用希腊词与牛的繁殖有关系。”<sup>[5]45</sup>其大致思路是从别人处借来的牛所生的牛犊应该归其主人,故而最后归还时牛犊和牛要一并交给其主人。同样,借来的货币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也要以利息的方



式与本金一同交给其主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看来,利息叫 tokos,是因为后代与其父母同属一个种类,tokos 是从其他货币中生出的货币。”<sup>[5]45</sup> 这种说法可能适合于游牧民族的案例,但从互惠角度对利息的理解有着更广泛的解释力和合理性。“我们偏向于认为 tokos 的利息意义是追溯于一般的生长之意,而非牛的特别案例。”<sup>[5]45</sup>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用的理论思路相对,在一般的习俗和制度层面,也存在一条理论谱系的线索。“作为词源学解释利息的一个替代,这能够有助于从制度上加以思考,从赫西俄德所描述的礼物赠予过程的细节中可找到依据。”<sup>[5]45-46</sup> 赫西俄德在其《工作与时日》中提供了从互惠式礼物回报的角度理解利息的最早线索。“《工作与时日》的评论家们本能地将这种额外的支付解释为‘利息’,利息一词被莫斯用于描述现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礼物赠予相似的情况。”<sup>[5]46</sup> 从赫西俄德到莫斯,代表的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孳息说”相对的“互惠说”理论谱系,而这条主线也能找到词源学上的证据支持。古希腊词语“palintokia”即指将一部分利息返还,说明利息与互惠关系的严密交织。“palintokia 概念因而代表了回到《工作与时日》里描述的系统,利息并不是作为一个同意条件而由债权人强加的。”<sup>[5]49</sup> 一种是基于互惠甚至自愿而进行的债务双方对利息多少的协商,一种是将利息看作债权人的权利而强加于债务人,这两种借贷双方的不同关系可以看作利息来源的两种观点相对应的延伸。“麦加拉(Megarian)的 palintokia 的反面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胜利,给予他们对利息收取的完全控制。”<sup>[5]50</sup>

理解这两种利息来源观点及其对应的信用双方关系的一种可能思路是互惠协商说早于孳息强制说,且前者明显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但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宣传等,后者逐渐居于正统的统治地位而遮蔽了前者。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有息债务出现的时间较晚,它被排除在互惠关系之外的。“表示有息贷款的词 tokizein 在早于公元前 4 世纪的所有现存材料中没有找到,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晚才出现的现象。”<sup>[5]30</sup> 在有息债务出现并发展以后,债权人就有动机通过法律等制度手段将基于互惠协商的利息转化为强制性的权利。“通过象征性地将债务等同于偷窃,一种法律上的对债务违约者的制裁制度逐步得以建立。”<sup>[5]42</sup> 将利息从法律上等同于债权人的权利和财产,不付利息等同于偷窃,要加以制裁,利息强制支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逐渐得以建立。同时,利息强制收取是合理的这种思想开始影响人们的观念并试图遮蔽利息是基于互惠协商的说法,这在一些学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依据。例如吉诺比乌斯(Zenobius),“虽然他是在公元 2 世纪写作,但其作品可以反映出试图保留债务中礼物因素的努力,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法律上的正式的强制责任”<sup>[5]42</sup>。无论是法律影响下的现实实践,还是人们的观念转变,都表明了对债务和利息的两种理解思路的激烈交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腊城邦的再分配功能为利息的强制支付提供了便利,“强制债务得以实施的原因是债务必须进行公共记录”<sup>[5]22</sup>。

债务和利息的强制实施是在博弈和讨价还价中逐步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的,这可以从著名的梭伦(Solon)立法中找到支持。“从早期雅典的历史可知,梭伦的立法废除了使债务人成为奴隶的规定,其补偿是承认债权人收取强制利息的权利。”<sup>[5]50</sup> 正是这种一步步的转变,使得主流观念对利息的起源和债务双方关系的理解开始偏向于孳息强制说,这种转型可简要地加以概括:“信用的这种替代类型转变可尝试性地将它的可能起源追溯至赫西俄德所建议的自愿‘利息’支付,经过麦加拉的德莫(Demos)对 palintokia(归还利息)明显的坚持,后由梭伦以法律形式保障出借人对强制利息的权利。”<sup>[5]52</sup> 正是在这两种理论谱系的交叉和转变的基础上,利息的征收获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和思想上的主导性,虽然争议和交锋从未停息。正如在主流的理论阐释是从互惠协商转向孳息强制,需要借贷的家庭和个人在借贷来源选择上也是首先从熟人间的互惠然后到无息及有息的债务。“与雅典友好的受青睐的无息债务的观念相一致,利率随着借贷双方之间社会距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sup>[13]60</sup> 是否支付利息以及支付多少利息是由债务双方在社会关系上的空间序列决定的,关系越



是疏远,所要求的利息和担保就越高。“一个基于社会距离的利息决定理论具有灵活性的优点。”<sup>[5]106</sup>

在具体的案例之中,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由于错误的行为而信誉扫地,难以获得熟人的互惠式信贷支持。“由于这种反社会的行为关闭了个人信用的通常来源,埃斯基涅斯被迫依赖非个人的附息信用,从银行家及其同僚处获得了一笔贷款。”<sup>[5]212</sup>此外,熟人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中收取利息是可接受并且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涉及金额较大的情况下。例如一个朋友向阿里斯托芬借16米那(mina)时,提议用一只金杯作抵押,并支付利息。“阿里斯托芬说他会拿走金杯,接受4米那作为利息,但他也要从别的地方借。”<sup>[13]58</sup>利息支付行为不仅限于信用借贷,在贵重物品的保管方面支付的费用也可以看作利息的一种。“个人为获得便利而将商品、动产和少量黄金等交由专人代为保管,作为特权和安全的回报,存储人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许多商人要经常远行,也乐于支付这笔费用。”<sup>[14]11</sup>这种保管业务是将闲钱存入银行的储蓄业务的前身,不过区别在于存储人不是收取利息,而是支付利息。无论是借贷还是保管业务,说明存在广泛的社会需求,它们为利息的收取提供了充足的客观条件,靠收取利息谋生的职业和人群也开始出现。

## 六、古希腊利息的浮动范围与社会影响

基于神庙的信贷业务,闪米特人(Semites)是最早的职业食利者。“神明为其资金所冒的风险要求补偿,金属借贷不利于实物的安全,因而闪米特人实际上变成了高利贷投资者。”<sup>[14]11</sup>神庙是早期信贷的主要提供者,借贷数额一般都不大。“拉姆诺斯(Rhamnous)神庙的账户表明,小额而非大额的债务才是正常情况。”<sup>[5]174</sup>在借贷业务中,神庙也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通常是固定数额。“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2世纪,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神庙收取利息的利率一直保持在10%不变。”<sup>[5]108</sup>总体而言,古希腊的利息收取比例应该是固定的,这种行为是嵌入在非正式的习俗和惯例中的。“与假定利息完全自由浮动的理论相反,我们认为雅典的利率由习俗和传统所固定。”<sup>[5]97</sup>在每个时期都会有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利息率,在古希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利息率是每个月1%:“‘通常’或‘流行’利息率给非私人的附息债务是每米那1德拉克马(drachma),或每月百分之一。”<sup>[5]105</sup>当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即使是“流行”的利息率也会有所不同,现有文献整理的的数据表明古希腊每年利息率的浮动范围在10%—36%,具体数据参见表2<sup>[5]104-105</sup>。

表2 古希腊年利率浮动范围

利率(每年)/%	案例
10	离婚后夫家拒还女方嫁妆需要支付的利息
12	1塔兰特货币的利息
12.5	海事贷款
16	16米那贷款,实物担保
16.67	陆上贷款,在基齐库斯(Cyzicus)担保
18	4 000德拉克马的利息;30米那债务“买”公职的利息;夫家拒还嫁妆所欠的利息
20	拟定食利者协议的回报率
22.5	海事贷款
25	为16米那贷款支付20米那本息
30	海事贷款
33.33	拟定食利者协议的回报率
36	海事贷款

注:古希腊夫妻离婚后,夫家需要将女方的嫁妆退还,如果不退还,就要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利息。

从前面阿里斯托芬的案例来看,其收取的利息率是25%,虽然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利率过高,但在古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则可能是正常且合理的。“不能从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在源初意义上所有的带息借贷都是‘高利贷’。”<sup>[5]180</sup>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用于借贷的资金来源不多,能带来回报并支付利息的投资机会也不多,并且投资风险很大,因而高利率是对稀缺和风险的补偿。“实际上,小额借贷很少是看起来的高利润业务,高利息率更多的是风险和行政成本的表征,而不是代表过多的利润。”<sup>[5]186</sup>过高的风险决定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往往局限于熟人之间,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来看都是如此。“鉴于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很难理解正常人会将钱借给亲朋好友之外的任何人。”<sup>[5]84</sup>但也这反过来说明超出熟人圈子的借贷要收取高额利息以及要有担保措施以应对巨大风险的合理性。投资海外贸易的利息率往往更高,以追逐经济利润为目的,要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雅典公民和非公民都可以签订海洋合同,其投资的借贷利率很高,高于一般债务12%的年利率,为12.5%—30% 每趟,罗马的海洋信用通常是排除在利息管理之外的。”<sup>[1]101</sup>农业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很难积累出多余的资金,因而借贷利息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有息借贷都被称为高利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约中世纪。“直到中世纪,‘高利贷’的概念才开始局限于指代超高的利息率,即它今天的含义。”<sup>[5]181</sup>

在古希腊,从事高利贷行业的往往都是外邦人,这和有息贷款的性质相关,它主要适用于陌生人之间。“可能是巧合,在讨论任何从事高利贷的人的来源时,他都是一个外邦人或非希腊人。”<sup>[5]186</sup>从借方的角度看,外邦人处于陌生的社会网络圈子里,没有互惠式借贷的便利,只能诉诸正式的有息借贷业务。“特别是对外邦人而言,他们没有公共支付的缓冲,也没有大多数市民拥有的相互交往的机会。”<sup>[5]188</sup>因而,无论是从借方还是从贷方而言,高利贷与外邦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外邦人所处的环境也与之后的陌生人社会非常相似,是附息借贷生存的土壤。“不同于亲戚和朋友,完全陌生的人可能是非雅典人,感受不到利用一个人的不幸赚钱的内疚。”<sup>[5]56</sup>除了自身内疚之外,外邦人也不会受到来自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当然,一些有财力和声望的外邦人也会形成自己的交往圈子用于获取支持和帮助。

附息借贷业务的重要社会影响是瓦解了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紧密社会关系,将其变成陌生人社会。因而,对于利息,主流观念不仅在道德上批判它,而且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希腊罗马的古代立法最早关注的一点是个人间债务的清偿以及对个人抵押品和利率的控制等”<sup>[1]96</sup>。在现实中高额的利息和巨大的投资风险确实容易造成债务违约,从而引发危机,影响社会稳定。“公元前4世纪中期左右,一种用铜币的附息借贷导致一场非常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债务危机,以致国家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利息率。”<sup>[15]13</sup>古代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债务和利息的规定,以防债务危机对社会共同体秩序的冲击,也有许多法律流传下来。“公元前1世纪以弗所(Ephesus)遗留下来的一部债务偿还法律区分了不同的债务类型,可用于界定典型债务交易的范围。”<sup>[1]99</sup>一些债务法律条文甚至会对债务关系进行相当具体细致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借贷活动的真实情况。“正如多数西方法律系统,在古希腊罗马法律中有两种担保债务的方法:个人或团体用自身的财产进行私人担保以及以资产的经济价值进行实际担保。”<sup>[1]99</sup>对利息和债务的法律规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危机的影响,稳定了社会,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对债务偿还进行更好的法律保障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债务量不代表经济发展水平。”<sup>[1]95</sup>古代社会的消费性债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就不大,而且债务量的积累可能是违约风险加大的标志,反而有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 七、古希腊债务取消的社会作用与政治博弈

当整个社会的债务积累数量巨大,社会秩序会遭受冲击时,债务取消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选

择。除了社会稳定的需要,利息的互惠协商观点也可为债务取消提供舆论上的合法性,具体结果则要看债务双方的力量博弈。“大量债务人是国家早期形成中的一股真实的政治力量,债务取消是地中海共同体历史中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sup>[1]96</sup>历史上有众多债务取消的著名案例,以雅典的梭伦改革为首。“梭伦抛弃了雅典人对债务的私人追求,公元前326年罗马的波特里亚(Poetelia)法律禁止了尼克萨姆(Nexum)借贷合同,公元前5世纪《十二铜表法》降低了利率,克里特禁止生活必需品的抵押。”<sup>[1]96</sup>债务取消是对债务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反击,在面临危及整个社会的风险时,债务取消不仅保护了债务人,而且在促进共同体团结应对社会风险上也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面对歉收和饥荒,受不可控因素影响的资源稀缺的道德结果是对债务人和债权人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保护。”<sup>[1]96</sup>债务危机的后果及其处理方式不仅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更是债务双方政治影响力的博弈,故而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古风时代的希腊到罗马帝国时代,债务危机的解决和个人争执的判定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sup>[1]122</sup>正是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希腊,债务取消成为一种普遍的债务危机应对方式。

债务取消最为著名的案例是梭伦改革,根源是利息的无限增加。“这种无限造成了债务的严峻危机,梭伦被任命来解决它。”<sup>[3]94</sup>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及其社会分裂的后果,梭伦改革除了改变雅典铸币的重量标准体系之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取消债务。“最高统治者梭伦采取了三项补救措施,债务取消涉及债务人的安全、法律和宪法的改革以及货币的变化。”<sup>[14]44</sup>梭伦改革取消债务的一个根本目标是保护雅典公民不受债务的影响而失去公民身份,这与雅典城邦共同体的互惠观念相一致。“梭伦关注的中心是将自由劳动力和非自由(强迫、非自愿、依附、胁迫,即额外或非经济因素)劳动力截然分开,并阻止雅典公民成为三种主要的非自由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债务奴、农奴和动产奴隶。”<sup>[16]162</sup>除了维护城邦共同体的公民基础之外,从政治支持的个人层面而言,改革措施为梭伦赢得了身陷债务困境的那部分公民的强烈支持,使之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种做法也启发了之后的政治家们,“受欢迎的领导人(以及潜在的僭主)通过暗示土地再分配和债务取消而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sup>[5]43</sup>。无论如何,梭伦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效果,深刻影响了雅典城邦共同体之后的发展。在满是债奴的古希腊,“后梭伦时代的雅典习惯被看作这一规则的巨大例外,这是梭伦著名的禁止借贷法律的结果”<sup>[5]78</sup>。

在古希腊城邦层面,债务取消比较典型的是斯巴达,该城邦甚至一度拒绝使用铸币,对货币和信用的社会影响一直非常警惕。“公元前3世纪后期,债务取消活动归功于阿吉斯四世(Agis IV)和克莱奥梅尼三世(Cleomenes III)。”<sup>[5]20</sup>其他的希腊城邦同样也存在着债务取消的诸多案例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斯巴达之外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有关废除或免除债务的法律。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阿舍里(Asheri,1969)所作的案例汇总中列了40个案例,其他案例还可以增加。”<sup>[5]21</sup>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sup>[5]251-252</sup>。

表3所列的法律案例足以说明债务取消在古希腊广泛存在,而这一结果的呈现与利息强制征收写进法律一样,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政治博弈的结果。支持债务取消的一方认为,在战争和饥荒等重大社会风险面前,需要城邦全体公民团结一致,应消除共同体内在的不和谐。“例如,埃涅阿斯(Aeneas Tacticus)建议,在被包围的城市,市民所欠的利息甚至本金应该降低或整个取消,以降低心怀不满的债务人背叛城邦的风险。”<sup>[5]21</sup>反对债务取消的债权人集团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他们掌握权力后会竭力禁止债务取消。“预防措施包括雅典陪审团的宣誓,禁止债务取消和私人财产的再分配,而公元前338年的‘科林斯联盟’(League of Corinth)的一个立约目的就是保证没有成员城邦会废除债务。”<sup>[5]21</sup>其实,债务取消的案例越多,反过来说明利息强制征收的现象越严重,其实际数量只会比债务取消的案例更多。“特阿真尼(Theagenes)后的麦加拉的案例与梭伦之前的阿提卡类似: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会利用职位优势剥削和压迫处于困境中的人。”<sup>[5]49</sup>而利用他人的不幸和困境谋



利是利息征收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3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债务废除法律的40个案例汇总

序号	时间(公元前)	地点	序号	时间(公元前)	地点
1	594/3	雅典	21	约300/299	以弗所
2	570以后	麦加拉	22	约297/6	以弗所
3	510以后	克罗顿	23	约280	卡尔萨亚
4	504	库迈	24	约280	纳克索斯
5	408	西利布里亚	25	约280	萨摩斯
6	403	雅典	26	约250—240	苏鲁斯
7	400—350	阿塞西尼	27	243/2	斯巴达
8	约390—360	德尔斐	28	约230	奥尔比亚
9	367/6	锡拉丘兹	29	227	斯巴达
10	约365/4	赫拉克里亚·潘提卡	30	约206/5	安托利亚
11	362/1以后	拜占庭	31	197	阿戈斯
12	360以前	阿拜多斯	32	197	阿里坎达
13	约353/2	雅典	33	188以后	奥尔霍迈诺斯
14	4世纪中期	希俄斯	34	179/8	马其顿
15	346/5	赫拉克里亚·潘提卡	35	174/3以前	安托利亚
16	331	奥尔比亚	36	174/3	色萨利
17	329/8以后	普里埃内	37	174/3(?)	法拉那
18	324/3	帖该亚	38	147/6	亚该亚
19	316/5	叙拉古	39	2世纪末	马耳他
20	约303	提欧斯-勒比都	40	86/5	以弗所

注：年份之间的分隔号表示不能确定或者不同分类纪年方法的差异。

当然,除了债务取消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之外,城邦共同体会通过习俗和制度等使其公民免除或减轻因为债务而遭受的压力。比如“赎回在别国为囚的本国人被看作一项公民责任,超过了亲戚朋友而到了作为整体的公民身份,类似于互惠借贷的理想情况”<sup>[5]61</sup>。这其实是将熟人、朋友之间的互惠关系推广到整个城邦的公民之间,有助于城邦共同体的团结一致。“这里有一个公元前4世纪邻居之间互惠关系的典型案例:由赫西俄德努力地建议,主要是社会上层精英用适当的服务回报城邦公民。”<sup>[5]54</sup>这种服务包括了代偿小额债务、提供嫁妆和抚养费等等,有效地减轻了许多公民的债务压力,“因为提供赎金、嫁妆和帮助等给身处困境的有需要的公民被看作一项公民义务”<sup>[5]64</sup>。在这方面,雅典等城邦要比其他城邦做得更好。“雅典的贫穷公民比希腊其他地方的同等阶层的人的处境要好很多,因而可以承受许多原本会让他们陷入依附境地和债务困难的压力。”<sup>[5]76</sup>此外,相较于梭伦式的债务整体取消,古老的利息的有限返还传统也是债务双方博弈中常用的一种折中方法。

八、结 语

古希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开始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农业社会,这决定了它的信用关系和货币制度的发展都是嵌入在熟人社会的习俗和惯例中的。虽然货币的使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古希腊信用的发展,但其主要信用关系的实质仍然是礼物互惠式的相互帮助,因而利息收取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利息的收取和债务的积累容易造成城邦共同体的分化和撕裂,时有发生债务取消运动是债务人和债权人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城邦共同体或社会对货币信用逐利增值侵蚀



社会纽带的反击,这种相互作用及其变体一直持续到了现代社会。

### [参 考 文 献]

- [1] von Reden S.,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Cohen E. E., "The elasticity of the money supply at Athens," in Harris W. V. (ed.),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6-83.
- [3] Seaford R.,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 Harris W. V., "Introduction," in Harris W. V. (ed.),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1.
- [5] Millett P., *Lending and Borrowing in Ancient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 Schaps D., *The Invention of Coinage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 [7] Millett P., "Sale, credit and exchange in Athenian law and society," in Cartledge P., Millett P. & Todd S. (eds.), *Nomos: Essays in Athenian Law,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7-194.
- [8] von Reden S., "Money in the ancient economy: 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Klio*, Vol. 84, No. 1 (2002), pp. 141-174.
- [9] Lloyd G., "Preface," in Cartledge P., Cohen E. & Foxhall L. (eds.), *Money, Labour and Land in Ancient Greece: 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xv-xviii.
- [10] von Reden S.,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 [11] Schaps D. M., "What was money in ancient Greece?" in Harris W. V. (ed.),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8-48.
- [12] Kyrtatas D. J.,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Cartledge P., Cohen E. & Foxhall L. (eds.), *Money, Labour and Land in Ancient Greece: 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40-155.
- [13] von Reden S., "Demos' Phialê and the rhetoric of money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Cartledge P., Cohen E. & Foxhall L. (eds.), *Money, Labour and Land in Ancient Greece: 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52-66.
- [14] Seltman C., *Greek Coins: A History of Metallic Currency and Coinage Down to the Fall of the Hellenistic Kingdoms*, London: Methuen, 1933.
- [15] Kroll J. H., "The monetary use of weighed bullion in archaic Greece," in Harris W. V. (ed.),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37.
- [16] Cartledge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eek slavery," in Cartledge P., Cohen E. & Foxhall L. (eds.), *Money, Labour and Land in Ancient Greece: 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56-166.

## Credit, Money and Interest in Ancient Greece

Li Xiuhui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Greece, credit was a common social phenomenon involving both small loans and the pawn of goods, as well as large monetary loans. The forms of credit included informal and formal, as well as interest free and interest bearing. Credit relationships were embedded in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of family and friends in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resulted in shared and reciprocal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neighbors and friends. Credit was not primarily an issue of economic value in ancient society but rather a problem of the 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Although credit and money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when they interflowed with each other, they were both reinforced, and debt was more valued and paid off in money. The use of ancient Greek coinage, especially the daily circulation of small coins, exacerbated this process. The purpose of borrowing wa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volving aspects such as reciprocity and redistribu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debt were the necessary factors of social surviv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were rarely economic or productive. The widespread use of credit activities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etary economy and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d for the shortage of money. In ancient Greece,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was the main method of risk response, and credit and debt relationships were included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ciprocal gifts. Reciprocal gifts and debt had a profound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receiving gifts and favors was itself a way of being in a debt relationship in the domain of social relations. Debt originated from gifts, and even formal monetary debt, if waived in an intimate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out the need for repaymen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debt owed to others. Debt is merely transformed into gifts, and the debtor is still in a state of debt that needs to be repaid or recompensed in a certain way in the future. Strangers were outside the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of individual Greek citizens and beyond the scope of reciprocal lending relationships. From circles of acquaintances to stranger transactions, reciprocity turned into commerce, and future returns became interest payments. Interest collection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there are two opinion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interest. One is that interest is the result of reciprocity or even voluntary negotiation with the debtor, and the other is that interest is imposed on the debtor as a creditor's right, representing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interest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stranger society. The proportion of interest charged in ancient Greece was relatively fixed, and the formation of specific amounts was embedded in informal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Even "popular" interest rates varied across regions and periods. Existing research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annual fluctuation range of interest rates in ancient Greece was between 10% and 36%. The important social impact of interest-bearing lending business w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los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community, transforming it into a society of strangers. Therefore, regarding interest, the mainstream concept not only criticizes it morally but also controls it through legal systems and other means. When the accumulation of debt in society is substantial and the social order is affected, debt cancellation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for social stability, reciprocal negotiation of interest can also provide publicity legitimacy for debt cancellation, and the specific outcome depends on the power clash between the debt parties. Debt cancellation was a counterattack by the polis community or society against the erosion of money and credit into social bonds, and this interaction and its variants have persisted till th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credit; money; interest; debt cancellation



-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 2012—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
- 2013 年、2015 年连续两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百强社科期刊”
- 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
-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 浙江省期刊方阵“精优型期刊”“浙江省一级期刊”
- 荣获第 26 届、第 30 届浙江省政府出版奖“树人奖”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评价机构、各数据库历年核心期刊及来源期刊
- 被 CSA、UPD、EBSCO、Gale、OCLC、IC、ICIJ 等著名国际机构的 14 个重要索引收录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Zheji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ban)

2023 年 第 53 卷 第 7 期

1955 年创刊 (月刊)

2023 年 7 月 15 日出版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浙江大学  
主 编 黄先海  
编辑单位 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 310028)  
网 址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电 子 信 箱 [zdxh\\_w@zju.edu.cn](mailto:zdxh_w@zju.edu.cn)  
电 话 0571-88273210 0571-88925616  
出版单位 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单位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邮编: 100044)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3, No. 7 July 2023

Started in 1955 (Monthly)

Published on July 15, 2023

Administra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Huang Xianhai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148 Tianmushan Road, Hangzhou 310028, China)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Web Site  
Email [zdxh\\_w@zju.edu.cn](mailto:zdxh_w@zju.edu.cn)  
Tel 86-571-88273210 86-571-88925616  
Publish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Printed by Zhejiang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inting Co., Ltd.  
Distributed Abroa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中国·杭州 HANGZHOU, CHINA (国内外公开发行)

乌利希国际期刊分类代码 (Dewey #): 300

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8-942X 国内 32-35 国内定价: 70.00 元 / 期  
CN 33-1237/C 国外 BM 372 840.00 元 / 年

ISSN 1008-942X

